

# 简·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之路

## ——写在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之际

傅燕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 女性主义批评在简·奥斯丁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确立了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作家身份。女性主义批评视野下的奥斯丁研究涉及诸多重要话题,包括“女性写作传统”、“女性观”、“婚恋主题”等。这些话题勾勒出了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之路,不仅与18世纪的英国女性有关,也与当代女性身份建构有关,更事关当代两性社会的发展与走向,关注与探讨这些议题意义深远。

**关键词:** 简·奥斯丁; 女性主义批评; 女性写作传统; 女性观; 婚恋主题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19)02-183-08

2017年,英国作家简·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简·奥斯丁协会组织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活动,旨在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致以深切的敬意。对于奥斯丁的研究学者而言,以文表意是最自然的方式。例如,美国学者谢丽尔·威尔逊于2017年9月出版了《简·奥斯丁与维多利亚时代女主人公》(*Jane Austen and the Victorian Heroine*)的著述,挖掘奥斯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批评或文学或通俗类读物中的存在感,揭示她如何影响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女主人公形象塑造,以及她本人的形象又如何被维多利亚社会所塑造。它既揭示了奥斯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来世”生活,也揭示维多利亚人将奥斯丁作为文学女主人公,在她身上寻求应对维多利亚社会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的出路。这也是奥斯丁女性主义批评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笔者也预备依样画葫芦,在此文中探讨奥斯丁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动态趋向,尽绵薄之力,聊表敬意。本文篇幅有限,难以穷尽所有的研究材料,因而仅呈献有开拓代表性的观点,希冀勾勒出这位伟大作家的“女性主义之路”。

奥斯丁作品如今在英国文学经典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女性主义批评在确立奥斯丁的经典地位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发现,奥斯丁与18世纪英国男权社会推崇的女性气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相信女人的理性能力,削弱爱情婚姻的浪

漫化因素,揭示婚姻的经济维度,对当时女性所处的经济政治状况保持着警觉。她意识到婚姻几乎是当时女性的唯一出路,却未为女性提供其他出路。奥斯丁是否可以算作女性主义者(feminist)? 20世纪70年代晚期之前,奥斯丁研究中鲜有女性主义批评的声音。而奥斯丁受女性主义批评慢待也是有原因的,有如达克沃斯<sup>[1]</sup>指出,奥斯丁在政治上采取无为主义,没有改善女性命运的计划,没有对父权制的批评,倚赖婚恋情节,对女性友谊的话题比较冷漠。不少研究者以20世纪女性主义议程来评判、框定她。但是,女性主义批评也逐渐意识到18世纪与20世纪的女性主义很不同,前者以反对当时男权社会推行的女性观为主要目标。那么,如何界定奥斯丁呢? 迪欧尼·路瑟作了精当的总结。“女性主义”的语汇在19世纪50年代才出现,到了19世纪80年代,其现代意义才被广泛使用,因而断定奥斯丁是否为女性主义者,不仅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她的小说,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女性主义。如果我们将女性主义宽泛界定为关注某种文化语境中女性如何受限、受到贬损,奥斯丁无疑参与了这场女性主义运动。如若女性主义被狭义界定为旨在根除性别、种族、阶级、性别歧视,推动女性命运改变的运动,在此语境下便很难冠以奥斯丁“女性主义者”之名。研究者有责任去探究奥斯丁的小说如何回应、包容或拓展当时英国社会的女性主义思想的范围<sup>[2]</sup>。克劳迪

收稿日期: 2018-05-25.

作者简介: 傅燕晖(1980—),女,博士,助理研究员.

通讯作者: 傅燕晖 yhfum@163.com.

娅·约翰逊、迪欧尼·路瑟等重要的奥斯丁研究者掀起了奥斯丁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高潮,证实了奥斯丁可以被界定为一位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源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妇女运动,即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在其蓬勃发展的年代是一种与社会实践密切交织的学术活动。在此背景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着既定目标,对旧文学文本提出新问题,旨在揭示或促进女性写作传统的发展,重新阐释男性视角下被忽视的女性写作中的象征意义,从女性视角去分析女作家及其作品,拒绝文学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提升对文本语言与风格中的性别政治的敏感性<sup>[3]</sup>。因而,它关注女作家身份、文学如何再现女性状况、女作家被排除在文学正典之外等问题。

奥斯丁从未脱离她所身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而是深深扎根其中,以创作小说的方式参与到当时关乎女性的政治论辩中,表达女性的政治诉求。本文尝试着按以下三个议题逐一探讨,选取有代表性的声音来揭示奥斯丁如何被界定为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主义之路”是如何铺就的。

## 一、奥斯丁与女性写作传统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关注奥斯丁的,挖掘男权社会中被忽视的女性写作传统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有必要检视一下此前男性批评家眼中奥斯丁的写作。

英国的女性写作虽然在18、19世纪得到兴盛发展,但在当时并未赢得多少重视。男性批评家眼中的奥斯丁是一个温顺的女作家,她书写的是规矩的女性人物与规规矩矩的世界。持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人物理查德·惠特利<sup>[4]</sup>在1821年指出,奥斯丁的一大成就是洞察女性特点,她的女主人公正是世人认定女人应有的样子,容易一见钟情,急不可待地想要吸引赏心悦目的男人的注意。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维多利亚时代知名评论家乔治·刘易斯<sup>[5]</sup>,他在1852年指出,奥斯丁的圈子虽然受限,却是完整的,他赞扬奥斯丁的语调与视角具有特别的女性气质,如此忠实于女性视角使得她的作品具备了持久永恒性。20世纪20年代,普里斯特利<sup>[6]</sup>在论英国小说时也指出,18世纪的女性写作中少有像奥斯丁那样尝试探索生活中女性化的一面以及女性化视角的,奥斯丁的小说具有冷静的女性化视角,未因强烈的同情心或欲望而蒙上阴影,她与小说人物保持着距离,洞察敏锐,惟妙惟肖。刘易斯等人的观点在很长时期内主导着评论的风向。奥斯丁被视为英国淑女,安居于乡村居家女性世界,漠视社会政治问

题,大概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

男批评家们“称道”奥斯丁的女性视角、女性世界,在同为女作家的夏洛蒂·勃朗特看来又是另一番风景。夏洛蒂在奥斯丁的“女性世界”里读到的不过是表象生活的优雅:细心围筑的篱笆,精心栽植的花园,干净的边界,精致的花朵。但是,那里缺少形象生动的脸蛋,开阔的乡村,清新的空气,美丽的河流。夏洛蒂<sup>[7]</sup>表示自己决不会想要和奥斯丁的绅士淑女们同住在那优雅却拘束的房子里。她在1850年写给编辑、老朋友威廉斯的信中对奥斯丁更直接地批评了一番:奥斯丁完全不知激情为何物,她甚至不愿意对激烈的姐妹情谊寒暄上几句,她是个十足的淑女,通情达理有余,却不是个完整的女人,甚至可以说是个相当麻木的女人,对激荡人心的情感熟视无睹。夏洛蒂的评判无意间埋下了伏笔,她与奥斯丁后来成为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开始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点关注的女作家,但代表了相互对立的女作家类型。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20世纪初探讨“女性与小说”、女性创作议题时,就已开始将夏洛蒂与奥斯丁放置在女作家天平的两端。伍尔夫多次强调奥斯丁的“超然”。1913年,伍尔夫<sup>[8]</sup>把奥斯丁受批评遭怠慢的根源指向她的反叛、不满情绪太少,她平静接受生活,有点“超然”。1929年,伍尔夫<sup>[9]</sup>在《自己的一间屋》中探讨父权社会男性主导的文学界里,女作家如何应对父权的控制以及女性创作所需具备的条件。她指出,夏洛蒂的愤怒损害了自身创作天分的发展,她在小说中不时表达个人的愤恨,妨碍她坚定而充分地表达自己所相信的真相。伍尔夫<sup>[9]</sup>暗示同为女作家,奥斯丁避免让女性的生活环境损害到她的作品,简直是“奇迹”,她在写作中“没有怨恨,没有苦涩,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和莎士比亚一样,他们的头脑能将所有的障碍物毁灭。伍尔夫<sup>[9]81-83</sup>赞誉奥斯丁能够避开女性性别身份对女作家的正直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她能够无视父权的声音,找到一种自然匀称的句子,恰当的风格,坚定地表达自己所相信的真相,保全了女性的正直。

指出奥斯丁与女性主义有关联的第一人应是批评家丽贝卡·韦斯特,她并不认同19世纪男批评家的论断。韦斯特在1932年指出,《诺桑觉寺》流露出很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奥斯丁是有着相当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家,是社会的批评家。韦斯特<sup>[10]</sup>主张,不能以奥斯丁的作品从未提及法国大革命为由,即认定她是直觉性、个人化的作家,认定她的创作源泉与当时的智性思潮无甚关系。

在女性主义批评崛起兴盛的20世纪60至80年

代,一系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力作随之问世,它们将19世纪中期作为英国女性文学史的聚焦点,奥斯丁被纳入19世纪女作家群体研究的范畴。女性主义批评重视女性创作的写实主义特点,试图勾画出女性写作传统。艾伦·莫尔斯<sup>[11]</sup>在《文学女性》中指出,奥斯丁在论及金钱话题时采取女性写实主义手法,关注男主角的经济状况,因为在婚姻是女性生活的唯一选择的现况下,这决定着她们的精神与身体健康,关系着婚姻生活的质量。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sup>[12]</sup>在1977年出版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梳理了从夏洛蒂到莱辛之间的女性写作传统,也略微提及奥斯丁,指出从奥斯丁到爱略特,女性小说朝着女性写实主义方向发展,全方位地探讨家庭与社区内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女性价值,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奥斯丁与玛利亚·埃奇沃思是参与小说发展史的女性先驱。戴尔·斯宾塞<sup>[13]</sup>在《小说之母》中指出,奥斯丁从前辈或同时代小说中汲取营养,她进而又成为当时业已成形的女性写作传统的一部分。

1979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经典力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中,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从女性的精神困境入手研究19世纪的女作家,揭示女作家在应对男权主导的文学传统时面临着“作家身份焦虑”,因而借助“双重角色”、“表层故事”、“双重话语”等间接策略,既能追随亦可颠覆男作家主导的文学传统,女性写作传统也在此过程中得以生成。奥斯丁在少年习作《爱与友谊》中大胆采用双重性手法,抨击英国社会对女性张扬性情的压制。她在成熟作品中则以含蓄的方式表达不满,表面上合乎礼节,实含批判,努力在张扬与压抑自我之间寻求平衡,表面宣扬温顺节制,其实掩藏着张扬与反叛之乐。奥斯丁不仅认同模范的女主人公,也受不那么良善、更具弹性活力的女配角的吸引,借由这些女性人物表达对其所处文化的反叛。奥斯丁的双重能力使得伊丽莎白、爱玛、安妮等人物具备了两面派能力,能够机智地表达她们的思想<sup>[14]</sup>。

两位研究者在书中把《简·爱》的“疯女人”推举为维多利亚时代女人渴望权力而不得状态的象征,定为女性反叛的经典范式。她们在奥斯丁的小说里找不到“疯女人”的影子。奥斯丁成熟作品中的女性都太理性、貌似“顺从”,未能像伯莎那样受内心矛盾掌控、走向疯癫,未能以浪漫化、戏剧化的剧烈方式表达反抗。而两位研究者推崇夏洛蒂的浪漫反叛,据此也未能给予奥斯丁的理性思辨才能应有的赞誉与重视。

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女作家与时代的互动,回到18世纪末英国社会的思想语境中探寻女作家的发展轨

迹,找寻其与英国政治历史发展的关联。玛格丽特·柯卡姆<sup>[15]</sup>的《简·奥斯丁:女性主义与小说》(1983)是第一本专著,将奥斯丁列入1790年代沃斯通克拉夫特等公开的女性主义者行列,将她们定位为启蒙女性主义者,依据是她们致力于改变女性惨淡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不完全支持传统道德观念,她们的女性人物是道德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能主宰自己的生活。

克劳迪娅·约翰逊在1988年的著述中以令人信服的分析证明奥斯丁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议题论辩,再现了一个具有很强政治敏感性的奥斯丁形象。克劳迪娅立足于探索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系,或作家之间的传承影响,揭示女性政治小说传统的存在,主张奥斯丁借用但同时又偏离了女性政治小说传统。克劳迪娅指出,1790年代政治思潮的遗产之一是既要求女人温顺谦让以保证男人的权威性,又鼓励女人参与时代的政治论辩。奥斯丁为了书写社会批评小说,必须使用颠覆或间接手法,既利用政治论辩的传统,又不完全为它所利用。研究者须将奥斯丁的观点置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关于人权、教育、权力、幸福、自由意志等问题的探讨语境下,方可揭示奥斯丁的特别所在。以《傲慢与偏见》为例,这是部欢欣快乐的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美满姻缘结尾,应允了人们的幸福请求,这本身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因为认可了追求幸福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是人生之要业。奥斯丁对男性权威代表人物达西的“傲慢”耿耿于怀,正是因为“傲慢”抢夺了一个人对其自我的认可,她对“傲慢”的处理也因此具有了政治意义。只有在达西拓展了自己的道德想象,能够做到尊重家人以外的他人之时,他才被认可,才成为可被接纳的丈夫。在此,奥斯丁与同时代的保守辩护家们分道扬镳,她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前提,应允伊丽莎白追求幸福的政治权利,也设想了可改造的良善的男性权威来包容女性的活力与需求,但她并未深情拥戴现有制度或代表现有制度的男性权威。奥斯丁在1790年代的两极化论辩中找到并且拓展了被忽视了的中间道路<sup>[16]</sup>。

奥斯丁借用同时代小说的暗码与传统惯例,参与政治社会问题的论辩,与社会历史有着深度互动,这是所有具有历史关怀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强调的。

## 二、奥斯丁的女性观

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是18世纪末英国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奥斯丁在这一方面的作为也是女性主义批评重点关注的对象。

奥斯丁的女性人物的“理智”很受关注。雷金纳

德·法勒<sup>[17]</sup>在1917年指出,奥斯丁重视“理智”,“理智”几乎是奥斯丁用过的至高赞誉词。奥斯丁的理想女性不是单纯不造作、优雅的女子,是“理智的人”,绝不受无知或单纯的捆绑,具有独立坚定的思想。前文提过,夏洛蒂对奥斯丁的“理智”是有所贬斥的,她认为奥斯丁理智有余,情感不足。奥斯丁的精神世界真如夏洛蒂所言吗?丽贝卡·韦斯特<sup>[18]</sup>的看法是否定的,认为奥斯丁的女子“为情憔悴或因爱得意”,对男人的回应又极为微妙复杂,使得后来的小说女主人公都黯然失色,不过,奥斯丁具有分析式的思维方式,坚决不受情感的迷惑,分享着休谟、吉本的智性世界。

戴维·默纳汉<sup>[19]</sup>在1986年总结奥斯丁的女性观,基本上已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界达成共识的。内容大致如下:奥斯丁并不认可当时盛行的女性观,她反对将温顺作为女子的重要美德,相信女人的理性能力,更看重女人的思想、心智的提升,而非才艺培养,她认为女人在两性关系中同样也可以扮演引导者的角色。奥斯丁显然不赞同当时的女性观,但她为何不似沃斯通克拉夫特,表达对当时女性角色的不满?奥斯丁意识到当时女性的社会角色相当受限,却并不认为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减弱,她主张女性在仪态方面、家庭生活方面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把家庭管理得井然有序,在维护社会现状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奥斯丁真切相信家庭是国家的微观缩影,因而家庭女性与政治家、战士或牧师一样,是于英国社会有用的人。

更系统、全面地从小说与社会、历史的互动来探究奥斯丁的女性观的当属美国学者玛丽·普维。普维采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尽力再现当时的女德书全貌,勾画出“得体的淑女”的理想女性形象,在此基础上探讨奥斯丁的女性人物设定。普维的重要主张是,尽管18世纪的英国社会对女性的自我、自我表达有诸多限制,这一时期的女性依然寻到了出路,通过间接的方式表达或满足自己的欲望。她们未必就意识到了这些限制,而是在日常生活行事中对意识形态的各种限制加以阐释,及时调节自身的欲望与满足感,找到符合传统礼仪而又真诚的自我表达。这些策略拓展了女性生活的可能性,但也是对现实的逃避。

试举一例精彩分析,《理智与情感》揭示了奥斯丁如何处理女性张扬自我与节制无度欲望之间的关系。奥斯丁急切地要控制沉迷于情感所导致的道德无政府状态,但又未完全限制它,削其力量。尽管奥斯丁倾向于现实主义书写,《理智与情感》却反复拒绝现实主义的分析,转而拥抱浪漫化的理想主义。不过,奥斯丁的浪漫主义情怀也从未使她完全放弃现实主义冲动,她

让道德准则与浪漫想象共存,让情感四溢的玛丽安摒弃了少女的浪漫倾向,小说整体而言支持节制有度的埃莉诺的克己品质。奥斯丁在小说的结尾处给予了奖赏,酬之以浪漫爱情以及幸福婚姻生活。此处的奥斯丁尽管意识到社会机制限制女性的情感,却不似沃斯通克拉夫特那般批判社会,她绝非要解放这股情感放纵引发的无政府状态的活力,而更关心如何矫正。她意识到英国社会所规定的“规矩的淑女”对女人的限制,但同时又对女性情感欲望的放纵深感焦虑,这些矛盾心理的思绪在《理智与情感》中一一表露<sup>[20]</sup>。

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致力于寻找隐蔽的更具颠覆性的性别政治特点,挖掘女性精神心理的隐秘角落。奥斯丁的女性人物中,爱玛的男子汉气概颇受关注,读来颇有新意,但此类研究也易与奥斯丁本人所身处的具体历史社会语境相脱节。

爱玛的某些特征一直吸引着评论者的注意,奥斯丁一生未婚的事实似乎也暗示着什么。1944年,美国知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sup>[21]</sup>有个疑惑:爱玛为何过了如此之久才与奈特利建立了和睦可亲的关系?威尔逊找到的答案是,除却父亲之外,爱玛对男人并不感兴趣。即便与奈特利结合,她也不过是把他当作父亲的替代品。爱玛对男人冷淡,对女人却着迷万分。

爱玛确实与奥斯丁的其他女性人物有所不同。马汶·穆德里克<sup>[22]</sup>从爱玛身上读出了奥斯丁的堕落,以病态称之,指责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堕落,时而认定是奥斯丁身为女人的冷感症,时而认为是奥斯丁的同性恋倾向所致。在穆德里克的分析中,奥斯丁不再以社会批评家的形象出现,只不过是发泄私愤的老姑娘。

著名评论家莱纳尔·特里林<sup>[23]</sup>在1957年也指出,《爱玛》最能全面代表奥斯丁的作品成就,而这部小说的难点也落在爱玛身上。人人不可避免地受她的吸引,折服于她的活力、风格与智力,其根源在于爱玛对自己的爱——自爱。从来我们都认为自爱是男人的道德生活的一部分,女人则另当别论。然而,爱玛特别的地方在于她像男人那样过着道德的生活。爱玛的自爱仿佛是她既定的品性,已然超过我们许可的限度,但奥斯丁并不把她作为特例,不作为一位新女性而存在。爱玛完全地沉浸在自爱中,也相当珍惜这份自爱。因而,爱玛非同寻常的存在若要被接受,需要人们的善意与理解。

克劳迪娅·约翰逊1995年在威尔逊、穆德里克、特里林等人对爱玛的研究基础上,聚焦爱玛的男性化特征、伍尔德先生的女人气问题,联系性别定位与当时的政治语境,把结论引向奥斯丁对女性角色的设定。克劳迪娅基本认同威尔逊、穆德里克对爱玛的观察,认

为爱玛容易受同性之乐的吸引,对异性之爱少有敬畏,她的活力与欲望难被求爱情节容纳。但是,20世纪中期的批评者聚焦爱玛的异常与任性,多数的评论止步于此,克劳迪娅则把爱玛的“异常”与社会政治语境联系起来。克劳迪娅认为,在18世纪90年代兴起的性别论题之争中,女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身份模糊的人,陷入性别危机。伯克、卢梭等人推崇的感伤主义传统认可男性情感的权威性,但将女性的情感贬低一等,贬低为无意识的、难以控制的、甚至是应受谴责的。在许多方面,《爱玛》成功地实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订立的伟大目标:削弱男性情感的权威性,重新赋予男女两性至高的国家性目标。传统的女性气质为爱玛所鄙弃,她欠缺女子气,爱玛身为女性人物是异常的,但《爱玛》对此并不感到焦虑。克劳迪娅比穆德里克更具洞察力的地方也在于此。他认为小说虽关注性别僭越,突显的却不是爱玛,而是男性人物的性别僭越。奥斯丁把多情善愁的伍尔德先生刻画得有些古派,对埃尔顿与弗兰克大加嘲讽,推崇奈特利先生的仁爱的男子汉气概,但并不贬低女性。小说指责的对象虽是爱玛,缘由并不是她没有女人样,而是她没有“人”样。《爱玛》虽也写于19世纪,勾勒的前景却不是女性情感使得女人具有了权威,能够从事慈善、教育、护理、改革团体等工作,展望的也非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气质所具有的力量,而是期冀女人也能拥有男性的独立自主<sup>[24]</sup>。克劳迪娅扎根于18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历史政治语境,而非现当代的性别僭越观,解开了爱玛角色的谜团。

克劳迪娅力图修正前文本对爱玛的“误解”,她对爱玛的“人性”的阐释似乎呼应了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表达的“雌雄同体”理想。伍尔夫<sup>[9]108</sup>指出,一个人身上最好同时容纳男子气和女子气,她期待作家(尤其是女作家)能够超越狭隘的性别身份限制,具备“雌雄同体”的心智,结合两性的精神,融入到创作中。因此,伍尔夫才盛赞奥斯丁的超越。但总体而言,女性主义批评似更青睐夏洛蒂的“疯女人”反抗模式,也因此忽视了奥斯丁对女性状况的更为理性全面的书写。奥斯丁不仅反对女性放纵情感,也避免了把小说当成个人情感的宣泄途径。就此,珍妮特·托德<sup>[25]</sup>认为,奥斯丁小说也相应无法传达出女性情感这一类情节原本可传达的政治或心理诉求。伍尔夫则认为,奥斯丁避开了女性性别身份对女作家的正直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她能够无视父权的声音,坚定地表达自己所相信的真相。而如上所分析,奥斯丁所刻画的真相,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有如学者黄梅所言,伍尔夫的观点提示我们注意奥斯丁所呈现的女性

形象(包括她本人所呈现的女作家形象)所具有的突破性的思想意义,至今仍值得人们深入推敲<sup>①</sup>。

### 三、奥斯丁的婚恋主题

奥斯丁小说的婚恋主题也备受热议。奥斯丁对婚恋主题的执着关注是有缘由的,有如詹姆斯·汤普逊<sup>[26]</sup>指出,奥斯丁认为婚恋是女性能做的唯一“工作”,婚姻是单身女子生活的保障,求爱阶段须付诸努力,培养爱意与敬意。但有些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奥斯丁的小说都以婚姻结尾,这仅是审美层面的解决方法,从文学形式看不能算是伟大作品的圆满结局,而从政治角度看,求爱与婚恋情节是保守的叙事框架,把女性圈进爱情世界和婚姻,牢牢地限制在附属地位中,这表明奥斯丁屈从于男性叙事规范,与父权制结盟。奥斯丁批评专家玛丽·普维、克劳迪娅·约翰逊在谈及奥斯丁的婚恋主题时似都持类似看法。普维<sup>[20]100 237-239</sup>在1984年的专著中采取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主张奥斯丁的小说叙事庆祝婚姻的缔结,这是在“节制个人欲望,服务于核心家庭经济单位的需要”,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体制的认可;《傲慢与偏见》原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作者却强行赋予浪漫结局,背弃了写实原则,从社会领域转向艺术领域寻求出路,这是一种“替代性满足”。克劳迪娅与普维的观点基本一致,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认奥斯丁笔下的婚姻“巩固且再造了既定的社会秩序”<sup>[16]89</sup>。

但是,用片面化的批判话语来评判奥斯丁的婚恋主题,势必忽视了奥斯丁故事的丰富性。如朱莉娅·布朗所言,简单论定奥斯丁是在推崇婚姻幸福的理想,是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评判,无视奥斯丁深刻再现了人类在婚姻制度问题上的意识变化,例如,《劝导》关注世俗社会所强加的两性“关系”的“质量”,对现代平等的婚姻伴侣关系加以展望(以海军上将克劳福特夫妇的婚姻为例)<sup>[27]</sup>。汤普逊也指出,奥斯丁对浪漫爱情保持着警觉,提醒人们注意婚姻的现实性维度<sup>[26]157</sup>,注意婚姻动机包含了情感道德经济维度。有学者在2005年总结近期的奥斯丁研究时也点明,奥斯丁看似屈从于标准化的婚恋社会机制,实际上她在再现浪漫爱情时是反浪漫主义的、务实的,甚至将人际关系经济化<sup>[28]</sup>。

多数当代女性主义批评都不认为她在再现传统婚姻、家庭社会秩序时持保守的态度。1975年,玛丽·伯根指出,奥斯丁笔下的婚姻是一种策略,用以将女主人公解救出父亲无能而造成的道德衰败的环境,而她们的丈夫提供了创造新秩序的可能。奥斯丁小说中排

斥“父亲”,表明她意识到了明理、仁慈的父亲是父权制家庭的支撑,她在探寻一种更有责任心、更仁慈的秩序之源<sup>[29]</sup>。尼娜·奥尔巴克在《哦,美丽新世界〈劝导〉中的进化与革命》一文中也有所呼应,指出温特沃斯对安妮的生活产生了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奥斯丁借助婚恋情节预示了新旧秩序的交替<sup>[30]</sup>。

女性主义批评在婚恋主题中引申出的另一线索是女性友谊情节。露丝·佩瑞<sup>[31]</sup>主张,在奥斯丁小说中,寻得男性权力的认可成为女性努力的目标,奥斯丁意识到这限制了女性之间关系的发展,限制了她们的想象与自主权。爱玛一心想为社会地位在她之下的女人牵线搭桥,安排婚事,结果她也忽视了与简之间较为平等的友谊关系的培养。奥斯丁在故事中削弱了男女浪漫故事的浪漫性,反复呼吁女性友谊,但她也反复描写受挫的女性友谊,揭示父权社会异性婚恋的优先权以及男权的威慑力。奥斯丁还注意到女性之间的阶级差异。路瑟在2002年指出,奥斯丁对女性友谊保持着警惕,她并不构建一个能够跨越阶级界限的女性群体,她在《爱玛》中暗含对女性父权的批判,揭示了女性友爱关系中可能存在着剥削利用的关系。她通过爱玛与哈丽叶特·史密斯的关系以及埃尔顿太太试图与简建立的关系,揭示父权社会中女性结盟的局限性。奥斯丁对这一时期女性主义者主张的女性情谊提出了质疑,但她同时又暗示了一种较为平等的新型关系。简与爱玛两人存有经济特权与社会地位的差异,这份差异借由简的才艺与品质得到弥合,弥补了社会等级差异造成的歧视等后果,这份关系也比爱玛与哈丽叶特的关系更为牢固。

还有学者指出,在婚恋情节的明线之下,奥斯丁更关注女性自身。苏珊·摩根<sup>[32]</sup>认为,奥斯丁未涉足18世纪小说中常见的女性贞节主题,没有性爱描述,在文学手法上是进步之举,为哈代、爱略特等作家探索社会对女性的限制铺垫了道路。奥斯丁的女主人公的成长与成熟并不靠着男性生殖器的催化。奥斯丁让她们对自身负责。盖尔斯<sup>[33]</sup>也持同样主张。《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相信自持、理智与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她克制自身欲望,抑制对埃德蒙的爱,拒绝克劳福德的求婚,成长为自己理想的模样:良善、虔诚、理智。范妮与自我的关系比她与埃德蒙的关系更重要,奥斯丁坚信女性的自我与坚决意志比婚姻更为重要,是构建女性身份的重要因素。

在探究奥斯丁的女性主义倾向之时,有学者如德博拉·卡普兰<sup>[34]</sup>在1992年即已强调奥斯丁身上具有双重文化遗产,不应忽视女性主义冲动之外的其他因素。18世纪的女性文化于她的叙事有着塑造性的影

响,但不能因此夸大她的女性主义冲动。奥斯丁有着双重性,受双重文化的吸引,既受两性平等思想的吸引,又受保守等级制士绅文化的吸引,她的立场是复杂的。联系这一双重性来看待奥斯丁的女性写作,研究视野也会更开阔、全面。

#### 四、结 语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带着既定的目标进入奥斯丁的文本的。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之路”反映了女性主义批评反抗父权社会对奥斯丁的“压制性”解读的过程以及女性主义批评试图通过奥斯丁确立女性写作传统。奥斯丁研究中很容易找到“压制性”解读的倾向,典型的如马汶·穆德里克在《简·奥斯丁:反讽是自卫与发现之路》中对奥斯丁进行性别攻击,奥斯丁借由反讽所传达的社会批评随即被解释为她求爱无门,对社会怀恨在心,于是在作品中尽情泄愤。在穆德里克的分析中,奥斯丁的写作所蕴含的社会批判力量被无视,其创作被仅仅视为某种个人化的表达。但是,克劳迪娅·约翰逊、玛丽·普维、迪欧尼·路瑟等奥斯丁研究学者以扎实可信的分析,揭示奥斯丁是一位有社会担当的社会批评家,使得穆德里克等人的观点无法立足。女性主义批评最终卓有成效地为奥斯丁辩护、正名,将她从男权传统的批评话语中解放出来。

奥斯丁的“女性主义之路”同时印刻着奥斯丁身后每个时代的女性主义思想、女性运动的发展历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18世纪的奥斯丁身上挖掘被男权社会忽视或埋没的女性写作传统,探讨奥斯丁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关注其与男性视角下女性人物的差异,关注奥斯丁婚恋主题的实质,这些举动从根本上皆是从当代女性的切身关注出发,试图在恰当解读奥斯丁的基础上反观现当代社会的女性状况,善用奥斯丁留给现当代女性的丰富遗产。当然,也有些解读从自身需要出发,明显夸大或扭曲奥斯丁的作品的。但上述的材料分析揭示了女性主义批评在尽量还原奥斯丁文本丰富与复杂性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种努力不仅服务于奥斯丁在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的确立,给予奥斯丁应有的认可,同时还服务于当代女性寻求两性平等的诉求。不过,女性主义批评虽然关注“女性视角”,却应注意到女作家奥斯丁身上最特别的特点或许正是她能够做到不为狭隘的性别身份所限制。奥斯丁在这一方面所留下的遗产仍有很宽广的探讨空间。

文学批评与实践活动密切交织,最终又回到实践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起源于女性运动,它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出的对女性境况的深切认知又会推动着女性运动向前发展,推动着当代女性在回望历史中去认识形形色色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提升自我意识,争取平等权利。吸收历史,使其化为我们当代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对历史的恰当方式。如上所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努力消化吸收历史上的奥斯丁留下的遗产,其中关于“女性观”“婚恋主题”的探讨,并不停留在奥斯丁笔下的18世纪英国女性,也关系到当代女性性别身份构建的重大问题。进一步而言,这些话题不仅关涉女性本身,也事关两性社会的发展与走向,亟待我们持续关注、探究。

#### 注 释:

①感谢黄梅研究员在此给出的建设性意见。

#### 参考文献:

- [1] Duckworth A M.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state: 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4.
- [2] Looser, Devoney. The Duty of Woman by Woman: Reforming Feminism in Emma [C]//Duckworth A M. *Emma: Complete, Authoritative Text with Biolog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Critical History, and Essays from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 Boston: Martin's 2002: 577-593.
- [3] Tuttle L. *Encyclopedia of Feminism* [M]. Harlow: Longman, 1986.
- [4] Whately R. On Jane Austen [C]// Southam B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68: 87-105.
- [5] Lewes G. Extract from "The Lady Novelists" [C]// Southam B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68: 140-141.
- [6] Priestley J B. On Jane Austen [C]//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Ltd., 1998: 451-452.
- [7] Brontë, Charlotte. On Jane Austen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68: 126-128.
- [8] Woolf V. An Unsigned Review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40-245.
- [9] Woolf V. *A Room of One's Ow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0] West R. The Feminism of Jane Austen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93-297.
- [11] Moers E. *Literary Wome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2] Showalter 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 from Brontë to Lessing*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3] Spencer D. *Mothers of The Novel* [M]. London and New York: Pandora Press, 1986.
- [14] Gilbert S M, Susan G.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5] Kirkham M. *Jane Austen: Feminism and Fiction* [M].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Ltd., 1983.
- [16] Johnson C L. *Jane Austen: Women, Politics and the Novel*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17] Farrer R. Jane Austen [C]// Southam B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45-272.
- [18] West R. This Comic Patronage of Jane Austen [C]// Southam B C. *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90-292.
- [19] Monaghan D. Jane Austen and the Position of Women [C]// Monaghan D. *Jane Austen in a Social Contex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1981: 105-121.
- [20] Poovey M. *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 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Mary Shelley, and Jane Austen*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21] Wilson E. A Long Talk about Jane Austen [C]// Lewis M. *Edmund Wilson: Literary Essays and Reviews of the 1930s and 1940s*.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7: 629-635.
- [22] Mudrick M. *Jane Austen: Irony as Defense and Discovery*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23] Trilling L. Emma [C]//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Ltd., 1998: 213-227.
- [24] Johnson C L. *Equivocal Beings: Politics, Gender, and Sentimentality in the 1790s, Wollstonecraft, Radcliffe, Burney, Austen* [M].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25] Todd J. Jane Austen Politics and Sensibility [C]// Ian Littlewood.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Ltd, 1998: 422-437.
- [26] Thompson J. *Between Self and World: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 [M].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7] Brown J P. The feminist depreciation of Jane Austen: A polemical reading [J]. *A Forum on Fiction*, 1990(3): 303-313.
- [28] Rajan R S. Critical Responses, Recent [C]// Janet Todd. *Jane Austen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1-110.
- [29] Burgan, Mary A. Mr Bennet and the Failures of Fatherhood in Jane Austen's Novels [C]// Ian Littlewood.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Ltd.,

- 1998: 341-356.
- [30] Auerbach N. Brave New World: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in Persuasion [C]//Ian Littlewood.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Mountfield: Helm Information Ltd. ,1998: 482-496.
- [31] Perry R. Interrupted friendships in Jane Austen's Emma [J].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986(2) : 185-202.
- [32] Morgan S. Why there's no sex in Jane Austen's fiction [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87(3) : 346-356.
- [33] Giles H. Resolving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ourtship novels [J]. *Rocky Mountain Review* ,2012(1) : 76-82.
- [34] Kaplan ,Deborah. *Jane Austen among Women*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Jane Austen's Becoming a "Feminist" Writer: Celebrating Jane Austen's Bicentenary

Fu Yanhui

(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732 , China)

**Abstract:** Feminist criticis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sitioning Jane Austen as a Canonical writer , and defines her as a feminist writer. Feminist criticism of Jane Austen covers various topics , including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writing , the ideal of womanhood and marriage plot. These topics not only concer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British women but also involve the identity construct of modern women. In the long run , they also relate to the direction where the human society moves towards. In this sense , it shall be a meaningful attempt to figure out how Jane Austen has become a feminist writer in the past two hundred years since her death in 1817.

**Keywords:** Jane Austen; feminist criticism; tradition of women's writing; ideal of womanhood; marriage plot